

吴越佛教

杭州佛学院
光泉 主编

第五卷

宗教文化出版社

吴越佛教



杭州佛学院
光泉 主编 编

第五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越佛教. 第5卷/光泉主编.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3

ISBN 978-7-80254-242-6

I. ①吴… II. ①光… III. ①佛教史-研究-华东地区-文集 IV. ①
B94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5471 号

吴越佛教(第五卷)

光泉 主编 杭州佛学院 编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73175(编辑部)

责任编辑: 霍克功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本记录: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32.75 印张 500 千字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242-6

定 价: 68.00 元

目 录

- 1 黄公元：“东南佛国”品牌建设与杭州发展研究
- 20 李 辉：提升杭州佛教软实力，打造东南佛国之城市品牌
- 24 张家成：东坞山“九庵十三寺”略考
——从一个乡村佛教的兴衰看“东南佛国”的变迁
- 29 王祥伟：吴越诸王与沙州曹氏归义军节度使同佛教关系之比较
- 37 金易明：出自白衣阶层的使命感
——发轫于吴越之地的近代汉传“居士佛教”现实成因分析
- 48 李发良、杨水田：佛舍利供养与吴越佛教
- 58 王 青：普陀观音道场的建立与兴盛
- 68 戴继诚：观音菩萨如秋月
- 73 张 帆：观音信仰的在地化与民间化
——以福建莆仙观音本事戏抄本为个案
- 85 心 悟：《千手眼大悲心咒行法》对于观音信仰中两个问题的解决
- 91 邓子美 廖文敏：太虚大师在杭州
——以契理契机的佛教革新开展为中心
- 99 尚永琪：龙光竺道生“慧解”考论
- 110 屈大成：庐山慧远的戒律观及其实践
- 120 杨遇青：论明末清初诸高僧的文学思想与创作
- 131 王娟侠：论元末明初笑隐一派的僧诗创作

- 140 海 慧:论印顺与熊十力空宗要义之辩
- 154 焦自军:从印顺的佛教研究看佛教的“无我论”
- 160 史 文:影像喻之中道观及其现代启示
- 167 徐时仪:略论佛经音义的校勘
——兼述王国维、邵瑞彭、周祖谟和蒋礼鸿所撰《玄应音义》校勘
- 179 界 空:允堪的教育思想
- 195 宗 志:《禅林宝训》中的僧团管理之道
- 211 沈海燕:论天台宗的修学次第
- 257 崔玉卿:天台大师智顓的佛学思想及其对中国哲学的贡献
- 264 夏金华:天台宗衰落原因探究
- 274 吴忠伟:勉忏悔者,实自讼之深者
——孤山智圆的身、心理论与宋初儒释思想的整合
- 284 刘朝霞:天台与唯识禅观比较初探
- 294 黄夏年:天台宗山家派本如神照及其直传弟子
- 309 肖 平 杨金萍:日本北岭天台宗的因明传承
- 313 陈永革:论晋水净源与北宋的华严中兴
- 331 邱高兴:宋代杭州华严思想的流布
- 337 陈芷烨 陈 晨:净土的大乘品格与人间性
——浅析印顺对净土义的阐释及传统净土宗的批评
- 345 崔正森 薄燕青:莲池株宏思想研究
- 352 德 澄:莲池大师的净土判教思想
- 367 宗 森:莲池大师与古杭云栖寺
- 381 俞朝卿:藕益佛学思想及其启示
- 385 界 性:永明大师净土思想研究
- 393 法 缘:永明延寿之禅净思想
- 418 陈荣富:永明延寿对禅净合一的重大贡献
- 426 孙劲松:永明延寿的乘戒兼急观
- 440 刘立夫:大慧宗杲与士大夫禅学

| | |
|-----|--------------------------------------|
| 450 | 袁经文:大慧宗杲“话头禅”理路钩沉 ——以《大慧书》为线索 |
| 472 | 吴正荣:论大慧宗杲的“大生死观” |
| 482 | 康庄 普慧:士大夫的修证之途 ——大慧宗杲书信研究 |
| 490 | 王仲尧:飞来峰上望 唱彻千山响 ——南宋灵隐寺佛海慧远论 |
| 500 | 蒋九愚 张 慧:密庵咸杰禅法思想探析 |
| 510 | 李尚全:意识形态化、草根化和知识化 ——汉吴佛教文化形成的三种途径 |

“东南佛国”品牌建设与杭州发展研究

黄公元

江南名城杭州的发展与佛教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杭州得天独厚的地域环境与丰富厚重的历史人文,承载和滋养着杭州的佛教文化;另一方面,杭州历史上繁盛的佛教文化,在杭州传统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是杭州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旅游胜地的一个基本依托。“地是佛国土,人非俗交亲”,杭州“老市长”、唐代大诗人、香山居士白居易约一千二百年前的这句诗,就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年杭州发展与佛教文化之间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密切关系。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两者的关系从总体上说更加密切,杭州赢得“东南佛国”之美誉,即是历史的明证。而今天杭州在新一轮的发展中,把打响“东南佛国”品牌作为杭州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更是两者关系密不可分的一个有力的新注脚。这也是抓住了杭州发展一大秘诀的明智之举。可以预见,杭州的未来发展,佛教文化依然会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东南佛国”杭州将继续成为繁华富庶的江南地区以及底蕴深厚的吴越佛教文化的一大亮点。

一、杭州“东南佛国”品牌建设之历史回顾

品牌,是个新名词;品牌建设,是时下流行的新说法。虽然古代无此说法,但古人也注意招牌、重视口碑,似可视为品牌及品牌建设的渊源。只是古人未必有今人一样如此明确而强烈的品牌意识,从而有目的、有意识地刻意创造或打造某个品牌。不过,也存在这样的情况,虽未刻意着力于某个品牌的建设,却在持续不断的致力于某一事业的过程中,长期的积累在无意中也会造就某个“品牌”,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行”,而这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比附今天的时髦说法,似亦可称之为品牌建设的历程。本部分的小标题,即是为了与本文第二部分(杭州如何打响“东南佛国”品牌)的小标题相匹配与呼应,而借用了“品牌建设”这一新名词。

杭州历史上赢得的“东南佛国”美誉,确实是杭州一块响亮的金字招牌,是杭州的一大著名品牌,至今仍具有巨大的魅力。在儒释道交融共同构成的杭州传统文化中,杭州丰富深厚的佛教文化是与美丽的西湖景观文化结合得最紧密、表现得最突出的一个部分。杭州历史上几大标志性建筑,如六和塔、雷峰塔、保俶塔,无不与佛教文化密切相关;数次西湖十景的评选,每次都少不了几个佛教景点;目前西湖文化景观

申遗的内容,至少有一半与佛教文化密切相关;直至杭州现在的城标,也离不了佛教文化这一基本元素。

杭州的佛教文化,不仅体现在佛塔、佛寺等佛教建筑文化上;更体现在历代所涌现出来的具有佛学素养的大量人才(佛教高僧与著名居士等历史文化名人),和他们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佛教思想文化,如众多深邃精湛的佛学著述,渗透着佛理禅思的广泛传颂的诗文佳作,以及他们对儒释道三教文化交融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还体现于诸如放生、香市、目连戏等佛教文化对杭州民俗文化的深刻影响和广泛渗透方面。杭州被誉为“东南佛国”,正是基于杭州丰富深厚而又极具特色的佛教文化底蕴。

杭州成为众所公认的“东南佛国”,有一个随着佛教文化在杭州的不断积淀而成为杭州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步呈现出自己的鲜明特色与巨大魅力的源远流长的过程。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进行必要的梳理,探寻杭州成为“东南佛国”及其名声不断提升、影响不断扩大的轨迹,或曰杭州“东南佛国”品牌孕育、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以展示佛教文化与杭州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

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曾有“钱唐赤乌,慧风始扇”的说法。^①也就是说佛教文化传入杭州是始于三国东吴赤乌年间(238 - 251),那时西域来华的高僧安世高、支谦、康僧会等在江南译经注经、弘传佛法,他们的活动对于时属东吴、且是孙氏故乡的杭州一带,自然会有一定的影响,这是不容置疑的。此乃佛教初传杭州之始。

杭州之有佛教寺庵的确凿文字记载,是在东晋时期。由东晋经南朝的宋、齐、梁、陈至隋代,随着佛教寺庵在杭州的陆续兴建与逐步增多,佛教在杭州获得较快的发展,佛教文化在杭州传统文化中的影响逐步扩大,地位逐步提升。虽然在东晋至隋代约四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杭州的佛教还无法与当时成为佛教传播中心的洛阳、庐山、建康(今南京)等相比拟,甚至在浙地还比不上会稽(今绍兴)与天台,但慧理、昙翼、真观、昙超、宝掌等中外高僧及谢灵运等具有很高佛学素养的名士已在西湖山水间活动,留下了不少佛教胜迹,说明佛教文化在杭州这块风水宝地已广泛传播并扎下根来。诸如:来自西印度的三藏法师慧理,在东晋咸和年间(326 - 334)初创灵隐寺、下天竺(时称灵山寺)等多所寺庵,乃是有文字记载的杭州最初一批寺院,飞来峰前的理公塔,即是缅怀慧理首开杭州山寺之功的历史见证;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385 - 433)曾寄居灵隐(谢因此而曾名客儿),并翻译佛经,故飞来峰玉乳洞至今尚有谢灵运翻经台遗迹;杭州人昙翼(又名僧翼,381 - 450),出家后曾先后依止当时的南方佛教领袖庐山慧远和北方著名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为东林莲社十八高贤之一,后回故乡在北高峰西北麓结草庵曰法华精舍,虔诵《法华经》十二载,是处即为今之法华寺;南齐时昙超(? - 492)由河北清河来到杭州,在青芝坞口开山筑庵,讲经说法,海化群龙而开辟玉泉;梁武帝萧衍(464 - 549)虔诚奉佛,并大兴佛寺,灵隐寺正是获益于他的赐田扩建,而成为杭州首具规模的著名佛刹;隋文帝杨坚(541 - 604)不忘智仙

① 见赵朴初为《杭州佛教史》写的题诗。

尼的养育之恩,而在灵隐山上所建之神尼舍利塔,乃杭城有史以来第一座佛塔建筑;^①杭州人圣达真观(547-611)于隋开皇十五年(595)起曾在下天竺头陀石室禅修讲经多年,后又在风篁岭畔构建精蓝,为南天竺开山始祖,他与天台宗实际创始人智者大师有甚深因缘,当时享有“佛法天下半”之美誉,受到隋文帝等的尊崇,他是杭州历史上弘传天台教观的第一人;中印度的千岁宝掌禅师(?-657)则于隋开皇十七年(597)来到武林山,喜天竺境幽,先结庵于今之中印庵修禅,后在稽留峰下兴建道场,授徒传法,是为中天竺寺之开山祖师;……正是以上这些高僧名士为代表的杭州佛教事业先行者们建寺弘法等一系列活动,为杭州后来成为“东南佛国”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及至唐代,佛教文化已成为杭州文化的亮点之一。这在自称“乐天,佛弟子也”的具有很高佛学素养与修持功夫的唐代大诗人、杭州“老市长”白居易的行止与诗文中有明显的表现。游览佛寺、与僧人交往、品茗论道、吟诗作文,成为白居易工作、生活中的一项充满情趣的高雅精神活动。他关于杭州的诗文很多与佛教有关。^②“地是佛国土,人非俗交亲。”白居易可说是明确将杭州称为“佛国”的第一位文化大名人。而且他在杭州留下了许多与佛教结缘交往的佳话,丰富了杭州成为“佛国”的内涵。如他与“鸟窠”禅师道林、诗僧韬光等的交往,“在杭六百日,入山十二回”^③,成为千古传唱的佳话;他的《华严经社石记》,生动记录了龙兴寺(现延安路凤起路口一带)结华严社十万人诵读《华严经》的盛况;白乐桥、孤山竹阁、香山洞等白氏佛缘胜迹曾长存西湖之畔,有的至今犹在。而唐代在白居易主杭前后,杭州也有诸多佛教史、文化史上负有盛名的高僧大德的足迹,如华严宗创始人贤首法藏大师的再传弟子法铤法师,华严宗四祖、有“七帝门师”之称的清凉澄观法师,径山寺开山祖师国——道钦禅师,曾与文殊大士机锋应对的无著文喜禅师,留下脍炙人口的“三生石”故事的圆泽和尚,等等。所有这些,无不表明唐代杭州,佛教文化已颇兴盛,因此才有白居易“地是佛国土”的赞誉,乐天居士“江南忆,最忆是杭州”的原因之一,即是“山寺月中寻桂子”,可见佛教文化在那时已是杭州成为历史名城的重要文化因子。因此,东晋到唐代,可说是杭州“东南佛国”品牌孕育与奠基的时期,杭州太守白居易可谓杭州打出“佛国”品牌并进行广告宣传的始作俑者,这也是他为杭州发展作出的诸多贡献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

五代吴越国时,由于吴越诸王从武肃王钱鏐起,一直到忠懿王钱弘俶,一贯奉佛,大兴佛事,杭州乃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大佛教中心,“东南佛国”之美誉名至实归,“东南佛国”遂成为杭州响当当的一大品牌。吴越国时期,“东南佛国”品牌建设成效显著,在杭城及其周围,新建、扩建了许多寺院,赢得吴越寺院“倍于九国”之说;当时建造的雷峰塔、保俶塔、六和塔,至今仍是杭城的标志性建筑;飞来峰、慈云岭、烟霞洞等

① 据《灵隐寺志》等记载,神尼舍利塔建成于隋仁寿二年(602),杨坚幼时由比丘尼智仙抚养长大,故在飞来峰建此塔以报恩。

② 参见笔者:《白居易的杭州诗佛缘》,《佛学研究》2004年卷。

③ 白居易在《留题天竺灵隐两寺》诗中自述他在杭州任职不到二年的时间里,仅灵竺一处即去过十二次,与灵竺的山水与僧人结下了深厚的情意。他在奉朝廷之命不得已离杭之前,特地到灵竺告别,诗中充满了对灵竺的眷恋之情。

处镌凿的摩崖佛教造像群，亦是当年杭城佛教兴盛的重要历史见证；当年大量雕印的佛典、佛像、经咒等，促成了杭城印刷术的长足进步与印刷业的大发展；住持佛法的高僧更是云集杭州，著名者如径山洪堙、天台德韶、慈光悟恩、螺溪义寂、镜清道愆、永明道潜、五云志逢、法真行修、永明令参、智觉延寿等等，不胜枚举。尤其是永明智觉延寿大师（904 - 976），重兴灵隐寺、住持净慈寺（时称永明院）、督造六和塔，高树法幢，著述等身，一身兼挑佛教禅宗、净土宗两宗的祖师，乃中国佛教史与文化史上的一代巨匠。延寿圆融会通的思想，奠定了人宋以来中国佛教发展基本走向的基础。吴越忠懿王钱弘俶曾亲自为延寿的百卷八十余万言的佛学巨著《宗镜录》制序，在赞扬延寿的同时，明确表述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思想，而且将佛教置于最高至尊的地位。序中如是说：

详夫域中之教者三。正君臣，亲父子，厚人伦，儒，吾之师也。寂兮寥兮，视听无得，自微妙，升虚无，以止乎乘风驭景，君得之则善建不拔，人得之则延颺无穷，道，儒之师也。四谛十二因缘，三明八解脱，时习不忘，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达真常，释，道之宗也。惟此三教，并自心修。《心镜录》者，智觉禅师所撰也，总乎百卷，包尽微言。^①

钱弘俶的这一认识清楚地表明，那时佛教文化在传统文化中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影响。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吴越国才大兴佛事，而此时正值北方佛教因动乱等原因而衰落，中国佛教的中心南移，江南遂成为中国佛教一个新的中心。尤其是在吴越首府杭州，更是凭借众多优秀的佛教人才，充分合理地利用依江面湖与周边群山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将杭州精心打造成为人间的天堂与佛国。

吴越末北宋初，钱弘俶审时度势，基于吴越国“保境安民”“奉事中原”“君轻民重”的治政理念与传统，又受到佛教文化的熏陶与影响，为了保护吴越百姓免遭生灵涂炭，维护有天堂佛国之誉的杭州不被战火破坏，太平兴国三年（978）毅然采纳永明延寿大师“舍别归总，纳土归宋”的遗嘱，上表尽献十三州之地、十一万兵、五十五万户于赵宋王朝，避免了一场几乎难免的流血战争，为促成长期分裂动乱的国家实现和平统一，保持江南的繁荣稳定与百姓的安居乐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这是佛法护国佑民取得杰出成就的典型案列。作为吴越首府的杭州，因此而得蒙恩泽，一直受到宋王朝的特别眷顾，从而更加繁荣兴盛，更加钟灵毓秀。南宋时杭州更忍辱负重地担起一国之都的职守，也因此而得到进一步的开发，成为享誉中外的世界名城。这一历史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也体现了佛教文化中因果律思想冥冥中所发生的作用？倘若没有当年钱弘俶接纳延寿大师遗嘱劝谕而采取明智举措之前因，何来杭州后来的进一步繁华，以及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临时首都”地位之后果？

入宋以后，杭州的佛教文化在吴越国已经打响的“东南佛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繁盛。此后历代直至近现代，杭州的佛教文化积淀在不断充实、丰富的同时，得到进一步彰显，“东南佛国”品牌顺理成章地成为历史文化名城杭州富有魅力的一块金字招牌。宋代的杭州佛教，高僧大德辈出，古寺名刹林立，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中心。

^① 见《大正藏》48卷，415页中；《宗镜录》又名《心镜录》《宗鉴录》。

北宋时期,由于赵宋王朝对杭州的眷顾关照,历任州官如王钦若、范仲淹、赵抃、陈襄、苏轼等的重视支持,再加上吴越时所奠定的雄厚基础,和西湖山水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吸引了许多一流的佛门高僧云集杭州,禅、教、律、净诸宗在杭州都非常兴盛。其中特别有影响的高僧,禅宗如灵隐的明教契嵩、净慈的圆照宗本等,天台宗如天竺的慈云遵式、孤山的中庸子智圆、天竺与龙井的辩才元净等,律宗如灵隐的明义赞宁、昭庆寺的真悟允堪、灵芝寺的大智元照,华严宗如慧因寺的晋水净源,净土宗如昭庆寺的圆净省常,如此等等,可谓僧才济济。还有不少有影响的居士名流亦荟萃杭州,诸如宋初名相王旦、孤山隐士林逋、无为子杨杰、“铁面御史”赵抃、文坛泰斗苏轼等等,可谓群星璀璨。这些高僧与名士,无不学识渊博、三教融通,或著述丰硕,或行持精严,或品行高洁,或才华横溢,他们的诗文、行迹与功业,大大充实并丰富了杭州的文化宝库,有效地提升了杭州的文化地位。北宋佛教史上,许多重要的佛教文献出于杭州高僧之手,最著名的当数延寿在宋初完成的《宗镜录》与《万善同归集》,其他如赞宁奉诏编撰的《宋高僧传》《大宋僧史略》《三教圣贤事迹》等,契嵩撰写的《传法正宗记》《禅宗定祖图》与《辅教编》等,智圆的《文殊般若经疏》《阿弥陀经疏》《楞严经疏》等(智圆有“十本疏主”之称),遵式编集的《法华三昧忏仪》《请观音忏仪》《往生净土忏仪》等(遵式有“百本忏主”之誉),元照的《行事钞资持记》《阿弥陀经义疏》等律学及净土著述,如此等等佛教文献不仅在中国佛教典籍中有重要地位和影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其中有的著作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教关系研究中以佛教为本位融通三教的颇有特色与影响的代表性文献,如明教契嵩的《辅教编》、僧统赞宁的《三教圣贤事迹》、中庸子智圆的《闲居编》等,对三教合一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演变有深远的影响。^① 后世被尊为净土宗七祖的圆净省常与宋初一代名相王旦为首的诸多士大夫名流在大昭庆寺结“净行社”(又名“白莲社”“易行社”)的净土行与诗文酬唱活动,不仅是中国佛教净土宗史上的一件盛事,也是佛教文化(尤其是《华严经·净行品》的思想)深刻影响社会文化、净化社会人心的一大胜事。高丽僧统义天入宋求法,曾奉旨专程到杭州,在慧因寺(高丽寺)依净源法师研习华严教义,并由无为子杨杰陪同到灵芝寺参访元照律师咨问律仪,高丽佛教与杭州佛教结下了甚深的胜缘,这是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名士与高僧的交往与唱酬,不仅留下了许多富有情趣的佳话与脍炙人口的诗文,他们邀约品茗谈诗论道的诸多雅事,还为杭州负有盛名的禅茶文化注入了生动的禅趣与厚重的文化底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经二任杭州的大文豪苏轼,在杭五年中他经常游山访寺,广交名僧,品茶论禅,吟诗作画,足迹几乎遍及杭州所有佛寺,东坡居士自述“吴越多名僧,与余善者常十九”,有诗自谓“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经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尽管“难传”,他还是诗兴勃发,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② 他在杭州时的方外之交十分广泛,其中特别著名的高僧有明教契嵩、大觉怀琏、圆照宗本(有“僧中宝”之誉的宗

^① 如宋初的佛教僧统赞宁认为“三教是一家之物,万乘是一家之君。”中庸子智圆认为,三教如三种治病的药物,各有所长,又如鼎之三足,不可或缺。明教契嵩认为“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儒者,圣人之治世者也;佛者,圣人之治出世者也。”

^② 苏轼的这首诗乃其离杭后所作的《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中的一首。其弟苏辙亦有诗为证:“昔年苏夫子,杖履无不之。三百六十寺,处处留清诗。”

本是苏轼特地从苏州请到杭州主持净慈寺为杭州人植福的)、灵芝元照(苏轼的弥陀净土信仰即与元照的劝化有密切关系)、辩才元净(东坡与辩才交往甚深,龙井至今尚有“二老亭”遗迹)、南屏梵臻、海月慧辩、径山维琳、参寥子道潜(著名诗僧,乃苏轼的莫逆之友、生死之交)等。北宋时期以苏东坡为最主要代表的名士与名僧的交往佳话及其诗文酬唱,不仅大大丰富了杭州佛教文化的内涵,提升了它的品位,扩大了它的影响,增添了它的光彩,也使整个杭州文化大为增色。苏轼乃是继白居易之后对杭州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又一位杰出代表,他对杭州佛教事业的大力护持(包括他对杭州“东南佛国”美誉度提升所作的努力与取得的成效),正是其诸多贡献中一个重要方面。

南宋时,杭州成为都城临安,首都之特殊地位,亦使杭州的佛教更趋兴盛而成为“江南佛都”,杭州寺院增至四百八十所,不少佛寺在全国有很高的地位和很大的影响。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有一佛门盛事,即按宗派源流品评江南诸寺,史上遂有“五山十刹”之说。在禅教律诸大寺中,杭州均有多所寺院入选,且名列前茅:禅宗“五山”,杭州不仅占有三席,且名列前茅,径山寺居首,灵隐寺、净慈寺次之;禅院“十刹”,则以中天竺寺为首;教下“五山”,杭州亦有三,以上天竺寺居首,下天竺寺、仙林寺次之;教下“十刹”中,杭州的集庆寺为首,演福寺、普福寺次之;律寺则以杭州的昭庆寺居首,六通寺、法相寺等次之。足见杭州之古寺名刹在江南佛教中之不同一般的尊荣地位与巨大影响。因此之故,北山的玛瑙寺依托杭州高僧云集的丰厚佛教文化资源,曾为杭州的著名高僧图像作赞并建阁供奉,“武林西湖高僧阁”成为展示“东南佛国”杭州的一大窗口。

当然,南宋时皇家显贵一度大肆占用寺院为家庙或园林,乃是当时朝廷与官场腐败的一大表现,也是都城临安佛教生态中的一种畸变现象,引起时人与后人的不少诟病,杨万里、陆游、周密等许多名士曾留下不少讥讽针砭此一时弊的诗文,这些特殊背景下的副产品,也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而朝廷显贵的这种侵害佛寺权益的倒行逆施,迫使一些寺僧在抗争无效的情况下纷纷离寺出走,有的去了杭州远郊的天目山余脉径山,倒也促成了径山寺的发展与兴盛,使之成为禅宗五山之首刹,荣登“江南第一禅林”之宝座,不仅吸引了国内许多高僧名士,还吸引了不少日本僧人上山问学求法,径山因此而比北宋时更加繁盛兴旺,声誉影响更著,不仅成为南宋时的佛教中心,还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南宋时不少当时负有盛名的高僧荟萃于径山,其中最著名者当数先后两次住持径山、力倡“看话禅”的大慧宗杲,另外还有无准师范、虚堂智愚、真歇清了、浙翁如琰、痴绝道冲、松源崇岳……,都是名重一时的禅宿,大多在入住径山之前或之后,驻锡过杭州市内的一些大丛林(如灵隐、净慈等)。与径山高僧结方外交的名士有张九成、陆游、范成大、周必大……,交往中留下了不少诗文。渡海而来径山学法的日僧,著名者有荣西、俊芿、道元、圆尔、沼明、觉心等等,回国后均各化一方,径山因此而成为日本临济宗的祖庭。而且,伴随着佛教交流,径山的禅茶文化也东渡日本,成为日本茶道的源头。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尤以无准师范(1177-1249)的影响为最大,师范的日本高足包括被日本天皇赐号为“圣一国师”的圆尔辨尔等“东渡十六师”,师范不仅通过其日本弟子使临济禅法盛行于东瀛,而且其儒释道三教一致的思想也为其弟子接受、宋学因之而传入日本,精于书画的师范的

作品传入日本后还被视为国宝予以珍藏。

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杭州佛寺,当然不止径山一处。由于南宋时杭州作为全国的佛教中心,许多名山名刹云集了不少著名高僧,所以入宋学法的日本僧人,大多慕名而来杭州参学问道,到过杭州的不少寺院,留下了不少佳话。如曾住杭州净慈寺与宁波天童寺的长翁如净禅师,将曹洞宗禅法付于日僧永平道元,成为日本曹洞宗的祖师;后来被封为“法灯国师”的日僧心地觉心,离开径山后到黄龙洞护国仁王寺参谒无门慧开禅师而开悟得法,还向张参居士学会了尺八的吹奏法,返日时将尺八技艺带回东瀛,使之成为日本的民族乐器,这是中日音乐艺术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南宋时杭州佛教与日本佛教的密切交往,不仅是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盛事,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亮点,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一衣带水的邻邦的一个重要管道。

在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处理上,尽管南宋诸帝在具体做法上有所差异,但总体上说,南宋基本上还是沿袭北宋时的路线。而在三教会通方面,宋孝宗的思想是最有代表性的。宋孝宗撰有《原道论》,论证并倡导“三教合一”,他认为三教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明确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观点。这使早已形成的三教各有特长、分工互补的传统文化格局,通过帝王之权威,得到更进一步阐释与强调。宋孝宗对三教关系的论述,自然适用于都城杭州,而且杭州还是据此处理三教关系的一个样板。

杭州佛教经过两宋前后三百多年的发展,“东南佛国”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彰显,内涵也更加丰富充实。不仅精英佛教在杭州成就显著,而且普世性的平民佛教,在高僧名士等精英指导与影响下,也有广泛的展开。“处处风送白莲香”,念佛风气广泛普及于民间;慈悲为怀的放生护生善举流行于民间,西湖亦成为天然的放生池;^①佛教的有些佛事活动,也逐步演化为民间习俗。

进入元代,杭州失去首都的重要地位,元代统治者又特别推崇喇嘛教,杭州佛教在全国的地位因之而明显下降。但元代在宗教政策上,总体比较宽松,汉传佛教依然受到朝廷的尊重。因此,元代的杭州佛教,一方面增添了藏传佛教的若干色彩,飞来峰的密教造像(至今基本保存)等,正是这方面的重要历史见证;另一方面尽管南宋皇城遗址一带遭到严重破坏,也殃及汉传佛教的寺院,但元代杭州的汉传佛教还是有一些亮点,如出家于净慈,曾住持云居山圣水寺、西天目山狮子院的元代最有影响的大禅师中峰明本,颇受元代朝廷的重视,先后两次获得皇上赐号(“智觉禅师”与“普应国师”),世称中峰国师,有“江南古佛”之誉,他继承发扬永明延寿以来融合佛教诸宗,融通释道儒三教,禅净兼行,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元初著名书画大家赵孟頫乃倾心仰服并皈依中峰明本的大居士,他为杭州留下了许多墨宝,包括给杭州的寺院题额、书匾、作画与撰题楹联等,使杭州的佛教圣地大为增色。曾在杭州净慈寺参学临济禅法,后住持普陀山的一山一宁禅师(1247-1317),奉元成宗(铁木尔)之命,率领一批僧人(如径山寺僧石梁仁恭等)东渡日本弘法,改善与日本的关

^① 在吴越国时,由于延寿等高僧实行并倡导放生,西湖已成为重要的放生水域。北宋初期,王钦若罢相来杭主政时,又向朝廷奏准西湖为放生池,放生护生遂成为杭州西湖的一种风尚。

系,他受命住持日本多所重要寺院,深受日本朝野的敬重,被天皇尊为日本的国师。

元代的杭州佛教,虽无宋时的兴隆盛况及尊荣地位,但由于杭州依然是当时享誉中外的繁华的江南名城,“东南佛国”的声誉还得以继续维系。元代杭州还是有不少高僧活动,就禅宗而言,有包括中峰明本在内的“四峰”,另三位是云峰妙高、高峰原妙(中峰明本之师,有“高峰古佛”之誉)、孤峰明德,他们基本上出于净慈,因对元王朝敬而远之,后避往西天目或径山,朝廷征召也谢绝不往;另外还有元叟行端、平山处林、崇寿慧矩(曾主持重建被毁的保俶塔,时称“矩菩萨”)、千岩元长、愚庵智及、笑隐大斲等,也颇有影响。就教下的天台宗而言,湛堂性澄与玉冈蒙润师徒,教观并行,台净双修,在元代佛教界也颇有声望与影响。性澄曾住持南天竺演福寺,后应召进京校正《大藏》;蒙润曾住持演福寺、龙井白莲庵、下天竺与净慈寺,著有《四教义集注》等。

明代从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开始,既对佛教有严格的限制,又重视佛教“阴翊王度”的作用。这一贯彻明朝始终的国家治理的基本思想与政策的确立,既与太祖曾出家当过沙弥有关,也同一位与杭州、尤其是与杭州佛教有着甚深因缘的名臣有关。这位大臣就是有“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美誉的无相居士宋濂(1310-1381),他儒释道兼通,虽以儒为本,又虔诚向佛,且自认为是“延寿后身”。^①他常与明太祖讨论佛教奥义,阐释佛教“阴翊王度”的作用,促成佛法与朝廷相互护持的良性关系。宋濂一生著有佛教经论序跋、僧人塔铭、功德碑记等大量文字,后被莲池大师辑为《护法录》行世,憨山大师誉之为“当代僧史”。他对永明延寿高树法幢的净慈寺感情特深,曾寓居净慈多时,还应请为净慈寺撰写过不少文字,其中为净慈寺高僧写的铭及序,辑入《南屏净慈寺志》的即达六篇之多。^②

有明一代,杭州佛教一直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明初洪武年间朱元璋在金陵(今南京)举行的重要佛事活动,杭州曾有多位高僧应召。其中最具有影响的即是有“明初第一宗师”之誉的楚石梵琦禅师。(1296-1370),他在元末明初均有崇高声望,有“六会禅师”之称(住持过杭州径山寺、大报国寺、海盐永祚寺等六大道场),元顺帝(惠宗)赐其“佛日普照慧辩禅师”,明太祖召其升座说法,赏赐颇丰。他禅净双修,著有《西斋集》等,莲池大师等对其有很高评价。此外,季潭宗渤(洪武时曾被推为高僧之首)、南州溥洽(因被疑与建文帝出逃有关曾被下狱十多年,后经道衍跪求永乐帝才获释放)、见心来复、独庵道衍(即姚广孝,朱棣心腹谋士,参与《永乐大典》等编撰,亦有多种佛教著述)、呆庵普庄、祖芳道联等,及宋濂为之写过碑铭者,皆是明初颇有影响的高僧。稍后,希古师颐、古渊智源、毒峰季善等在当时都颇有声望。

明代佛教最大的亮点,是晚明佛教的一度复兴,而杭州的高僧为实现这一复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莲池株宏、憨山德清、紫柏真可、智旭满益四大师为代表的一批高僧,以及李贽(卓吾)、袁宏道(中郎)为代表的居士名流,是晚明佛教复兴的风云人物,而他们大多与杭州有着非常殊胜的法缘。明末四大高僧即是佛教复兴的

^① 宋濂在《善继禅师血书〈华严经〉赞有序》中自述:未出母胎之前,母亲梦一异僧手持《华严》而来,曰:“吾乃永明延寿,愿假一室,以终此卷。”母梦醒,他即出生。因名曰“寿”,后更名为“濂”。以是因缘,宋濂深信自己是“延寿后身”。

^② 这是其他任何一所寺院都无法比拟的。这六位高僧是:广慧智及、孤峰明德、竹庵清远、逆川智顺、无旨可授、普仁德隐。

四个领军人物,四大师中居于首位的云栖大师莲池株宏(1535-1615),生于杭州,塔于杭州,除外出参学的几年之外,皆以杭州为基地大开法化,云栖寺是其根本道场,他僧俗弟子无数,朝野名流皆望风归仰,他一生著述丰硕,思想圆融,行持精严,基本特色是教依华严,归趣净土,劝人“老实念佛”,化人无数,莲池大师因此而被尊为净土宗八祖。云栖寺因有莲池大师而在晚明成为一大佛教圣地,清代及近代一直有很大影响,还受到雍正、乾隆等的关注,乾隆更亲临云栖瞻拜游访。复兴曹溪祖庭的憨山大师澄印德清(1546-1623),虽主要不在杭州活动,亦与杭州有很深因缘,他多次来杭,与法雨仲光禅师(紫柏真可弟子)在九溪理安寺倡结“念佛七”,应请为莲池大师撰写塔铭,为净慈寺撰《宗镜堂记》。倡刻并主持中国佛教史上首部方册本《大藏经》的紫柏尊者达观真可(1543-1603),就是在径山最终完成藏经雕版的浩大佛教文化工程的,因而这部有重大文化价值的藏经一般名之曰《径山藏》(因印制完成于嘉兴,故又名《嘉兴藏》),真可遭受迫害遇难后,其墓塔亦长存于径山。四大师中的最后一位,明清之际的灵峰大师满益智旭(1599-1655),曾在云栖作务、受戒,在径山参禅,为其后来成为宗说兼通、三教融会、著述等身的一代佛学巨擘,并被尊为净土宗九祖及天台灵峰派的创始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其根本道场北天目灵峰寺(在今安吉境内)亦在杭州文化圈内。而在四大师周围,不仅摄化了无数一般信众,而且吸引了当时大量精英人物,如袁宏道、陶望龄、冯梦祯、陆树声、黄汝亨、屠隆、虞淳熙、吴应宾、葛寅亮、吴之鲸、李日华、袁了凡、钱谦益等等,从而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东南佛国”杭州,因之而底蕴更为深厚。

清代佛教基本承续晚明佛教的余绪,清初诸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与汉传佛教都有颇深的因缘,对杭州的佛教与高僧青睐有加。有“佛心天子”之称的顺治帝福临,法号为行痴,与杭州高僧玉琳通琇、木陈道忞等关系密切,从玉琳受菩萨戒,封玉琳为国师,并一度请玉琳弟子茆溪行森净发;康熙帝玄烨五次南巡来杭,到过许多寺庙,多有赐赠与题字;雍正帝胤禛虽未来过杭州,但与杭州佛教因缘特别深厚殊胜,他对杭州高僧永明延寿、云栖莲池等颇为推重,尤其是对吴越宋初的高僧永明延寿更是推崇备至,称其为“古佛再来”、“历代善知识中尤为出类拔萃者”、“曹溪后第一人”等,刊行延寿的《宗镜录》与《万善同归集》,亲自御制《宗镜录大纲》,御旨修葺永明塔院,^①并亲自物色培养净慈寺的住持人选,而且他还通过李卫巡抚浙江,对杭州佛寺尤其是净慈寺的建设大加关照;乾隆帝弘历六次南巡杭州,到过的寺院比其祖父康熙更多,而且留下的诗文题字更多,封赏也更多,佳话不少。所有这些,有力地推动了杭州佛教的复兴,更为“东南佛国”杭州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这是清代佛教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使杭州作为“东南佛国”的地位与影响得到更进一步的彰显。

清代杭州佛教的著名高僧,初期除了有国师之称的玉琳通琇外,还有通琇的师弟箬庵通问、中兴灵隐的具德弘礼、中兴净慈的明幢、明中(二人即是雍正物色培养的僧才,乾隆巡杭时曾专程看望并有诗文酬唱)、在昭庆寺重兴律学的宜洁玉书等。后被尊为净土宗十祖的行策截流(1626-1682),即是箬庵通问在九溪理安寺剃度的弟

^① 关于雍正对延寿的推赞及其影响的详细分析,可见拙文《雍正皇帝与永明延寿禅师》,《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子,后在西溪河渚的莲柎庵潜修净业多年。而受具足戒于昭庆寺,相继在崇福寺、龙兴寺、仙林寺、梵天寺大弘净土的实贤省庵(1686-1734),后被尊为净土宗十一祖。^①如果算上清初尚在的晚明四大师中最后一位智旭藕益(1599-1655),数十年中杭州连续出了三位净土宗祖师,足见清初杭州佛教净土法门的兴盛,及其对当时及此后中国佛教发展演变的影响之大。清代中后期,随着国势的衰落,佛教亦随之衰落,杭州也难挽此一颓势,尤其是遭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杭州的佛教遭受极其巨大的破坏,元气大伤。总体衰颓的情况下,尚值得一提的亮点有:古昆玉峰在松木场建弥陀寺,弘阐净土法门,并在光绪二年(1877)在弥陀山石壁镌刻《阿弥陀经》巨型摩崖石刻(至今尚存);律僧发朗在昭庆寺重建戒坛恢复授戒,有“律宗中兴”之说(俞樾语)。

清末鸦片战争失利之后,中国进入多灾多难的近代社会,内忧外患,国难当头,衰弱不振的中国佛教更是雪上加霜,命运多舛。不过,严重的危机,恰好激发了佛教界有识之士绝地反击、除弊祛衰、自觉调适以重振佛教的强烈意识和宏大誓愿;救亡图存的悲壮运动,也给佛教在调适革新中中兴与转型提供了机遇。从晚清到民国时期(1840-1949),多种多样的救亡思潮和运动中,“佛教救亡”是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方面,它在以佛菩萨的慈悲无畏精神尽力救国的前提下,同时又努力拯救佛教自身。中国近代佛教是继晚明佛教复兴之后的又一次复兴,成为中国佛教演进史上的又一个亮点。这一时期的佛教是中国佛教近代转型的时期,苦难而严峻的时势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和贡献的高僧与居士,他们从不同的方面、用不同的方式引领并推进了中国佛教的近代转型或更新。而近现代佛教的风云人物太虚、印光、谛闲、虚云、弘一、圆瑛等,都与杭州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与杭州的僧俗四众一起为“东南佛国”杭州的佛教写下了又一光辉篇章。

这里首先要提的自然是近现代中国佛教革新的领袖和旗手、近现代中国佛学的集大成者太虚大师(1889-1947),杭州是其开展佛教改革运动和从事佛学著述的重要基地之一。1919年他在杭州净梵寺创办了近代佛教最有影响的刊物《海潮音》,他担任过杭州北山弥勒院与大佛寺的住持,1921年出任杭州南山名刹净慈寺的住持并实施其整理僧伽制度的改革计划,他还多次来杭州讲经说法,1927年在灵隐寺静养期间在慧明方丈、却非监院的护持下,潜心著述《真现实论》等重要著作,阐述其影响深远的“人间佛教”思想。另一必须特别提出的是近现代中兴南山律宗的弘一大师(1880-1942),他在浙江一师从事艺术教育期间,开始倾心佛教,并于虎跑定慧寺出家,灵隐寺受戒,玉泉寺研律学戒,招贤寺整理《华严疏钞》,云居山常寂光寺闭关,与弟子丰子恺居士编《护生画集》,晚年还专门写了《我在杭州西湖出家之经过》,圆寂后部分遗骨归葬于虎跑,并建塔供奉,后来又建了弘一大师纪念馆,弘一与杭州已融为一体,无法分离。还有,近代台宗泰斗、天台宗第四十三代祖古虚谛闲法师(1858-1932),光绪十一年(1885)应邀到杭州六通寺开讲《法华经》而突然入定,出定后即辩才无碍,后来他又多次来杭讲经说法,他十分关心梵天寺祖庭的复兴,1930年派其

^① 实贤省庵圆寂后不久,即被尊为继莲宗八祖莲池祿宏之后的莲宗九祖;后因在莲池之后又增藕益、行策为净土宗九祖、十祖,省庵遂依次递改为净土宗十一祖。

法嗣摩尘在梵天寺举办天台宗佛学院,培养了一批僧才。被佛教界一致尊崇为净土宗十三祖的印光大师(1861-1940),曾数度莅杭弘法,他赞叹弥陀寺的巨型摩崖石刻《弥陀经》,并亲为弥陀寺确定念佛规制,谆谆嘱托施省之大居士(曾任交通总长、时任上海佛教居士林林长)维护修复净土宗十一祖省庵大师道场梵天寺,亲为南高峰荣国寺、云居山常寂光寺撰写法会文疏、佛七缘起,与在杭州的弘一大师及辛亥革命元老张静江居士等有很深的法谊。近现代一身兼挑五宗法脉的禅宗泰斗、住世120年的虚云老和尚(1840-1959),早年曾在三天竺参禅研教多时,他一直关心杭州佛教的发展,1953年还不顾一百十多岁的超高龄,欣然应邀来杭在净慈寺主持祝愿世界和平法会,为时七天,成千上万信众慕名而来,要求皈依者近三千人,盛况空前,法会余款遵虚老嘱咐,用于修缮净慈寺、装饰佛像及补助佛教界办的普化小学。

除了上述领军人物之外,近现代杭州佛教还有不少卓有成就与贡献的高僧与一大批居士名流。1936年永明塔院重葺这一佛门盛事,吸引了那么多高僧名流参与并撰联题字,即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与明证。^①近现代与杭州有深缘的著名高僧还有:曾在海潮寺办华严大学的月霞法师,富有传奇色彩的灵隐寺方丈慧明禅师,曾主持灵隐、主持浙江省佛教会、创办武林佛学院的巨赞法师,住持招贤寺的弘伞法师,在梵天寺办天台宗佛学院的摩尘法师,辛亥革命前为革命党人提供秘密集会场所白云庵的“得山和尚”智亮,抗日战争期间号召山僧投入救亡运动的禅源寺方丈印西法师,等等。还有一度出家后又逃禅、精通梵文、诗文俱佳的亦僧亦俗的名士苏曼殊,亦与杭州颇有因缘。藏传佛教的贡嘎、诺那等密宗上师,也多次来杭州弘扬佛法。与杭州有深缘的近现代有影响的居士名流有:认为佛教乃反清革命与民族复兴必不可缺的良药的章太炎、创办辛亥革命后杭州第一个佛学团体“般若学会”的马一浮(一佛),上海佛学书局总编范古农,上海佛教居士林林长、佛教净业社董事长施省之,著名书画家、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白龙山人”王震(一亭),以弘扬念佛法门著名、曾任杭州佛学联合会会长的吴璧华,编著《金刚经讲义》的江味农,翻译日文版《南传大藏经》的弘一挚友与护法夏丐尊,《护生画集》作者、弘一弟子丰子恺,对科学与佛教关系有独到见解的浙大教授尤智表,辛亥革命元老黄元秀,等等。

杭州“东南佛国”品牌之形成与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可以大致概括为:孕育于东晋南朝,奠基于隋唐,形成于五代吴越,兴盛于两宋,延续于元明清直至近代。如用一条曲线来描述,大体上是条倒“U”字形的曲线。当然,它不是一条平滑的曲线,而是具有一定波动性的曲线,它基本上是与整个国势的变化、当局者的政策变化及佛教生存发展环境的变化等影响因子的变动相同步的。这刚好也是与佛教“缘起论”的思想相吻合的,一切皆是因缘所生法,“东南佛国”品牌亦是随因缘而生、而兴、而盛、而衰、或盛而衰,或衰而盛,或盛衰同存互现(有的方面盛了,有的方面衰了)……这也预示着近代以后,由于因缘的变化,既有可能衰,也有可能盛,盛衰皆视因缘而定。这也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辩证法。

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走向现代化

^① 具体可参阅笔者《慧日永明 智觉延寿——杭州净慈寺永明塔院楹联赏析》,《佛教文化》2004年第4期。